

## 13年三线建设， 37岁“惊险”考研

郑时龄祖籍广东，出生在四川，4岁时随父母到上海定居，在上海长大。

由于父亲过世早，郑时龄家庭条件并不太好，但他自小聪慧，喜好文学，也爱好画画，为后来选择建筑学专业埋下伏笔。

“中学的时候看了很多苏联电影，其中有一部讲造船工程师的，我看了特别受震撼，理想是做造船工程师。但是我又喜欢文学，所以也愿意考文学方面的专业。我画画也不错，学美术也可以。”郑时龄回忆自己年少时曾有过的理想。因为对社会了解不多，少年的他并没有太具体的人生规划，这一点和今天的孩子们其实没什么差别。

在“学好数理化、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社会环境中，郑时龄的文学理想遭到了家长反对。“学文学有什么用？”母亲不仅自己反对，还找来郑时龄的表哥帮着劝说。

彷徨之际，高三班主任给郑时龄一个更加周全的建议。“班主任说，你文科蛮好，画画也不错，可以去读建筑专业。我就这么走上建筑学的道路。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学一行钻一行，都能有很好的成绩。”

郑时龄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，学制6年。当时的高校，教育的目的是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”，学生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参加劳动。郑时龄记得每年秋收，他和同学们都要去崇明的高校畜牧场劳动，平常也有很多时间去建筑工地参加劳动。劳动之余，同学们

非常珍惜学习的时间，抓紧学习。

直到今天，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本科学制也是5年，比其它专业多1年。郑院士说，这是因为建筑师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，不仅是本专业的知识，还包括社会科学的知识。

1965年，郑时龄本科毕业分配到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。正是三线建设热火朝天的时期，郑时龄分配到的单位位于当时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地区——贵州遵义。但作为现场设计工程师，郑时龄和同事们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遵义“集训”，其他时间随着工程走南闯北。

13年的时间里，郑时龄在建设第一线工作，对军工厂、民用住宅、公共设施等等各种各样的建筑都有了设计经验。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恢复，37岁的郑时龄参加“文革”后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考试，重新回到同济大学。

提起报考研究生，郑院士说，过程相当惊险。

第一个惊险是因为他原本已经



左图：郑时龄中学时代留影。

超龄，后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才符合条件。

第二个惊险是他接到报名通知时截止时间非常紧张，差点就错过了这次机会。“我当时人在杭州，单位在遵义。我如果先领到申请报告，填好寄到遵义，遵义审查通过后再寄回杭州，我再去报名，按照当时的邮政速度肯定是来不及了。”幸运的是，单位对凤毛麟角的“考研”特别重视，杭州的招办通融说，只要遵义的单位发个电报到杭州就算数。但就算是遵义发电报到杭州，杭州再提交报名表给同济大学，时间还是来不及。杭州的招办马上与同济大学联系，请同济大学直接接收遵义返回的报名表，算是报名。如此的“破例”之下，郑时龄才幸运地获得了考研资格。

到了考试环节，依旧险象环生。由于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次组织考研，中间难免有疏漏的环节。最后一门考试时间到了，考卷却还没有到达杭州。郑时龄回忆，当时杭州招办只得赶快联系同济大学出一份新的卷子，一周以后再通知郑时龄去考试。“这些故事放到今天都不可想象。当时大家非常鼓励年轻人再去学习，尽量给我们创造条件。”

1978年，郑时龄成为同济大学建筑专业9名研究生之一。

## 城市建设“智囊”， 实践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

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，郑时龄